

共和国



纪实

共和国心脏地带揭秘

党史出版社



第

三

卷



## 周恩来的骨灰为什么放在台湾厅？

人民大会堂中，要说最让人牵肠挂肚的，当属台湾厅。

台湾厅总建筑面积约 660 平方米，由接见大厅，休息厅等组成，整体装修风格端庄雅丽、明快大方，具有传统闽台建筑风格、充满浓郁台湾风韵，给人一种回到宝岛故乡的感觉。

大厅正墙是长 8.5 米、宽 4.85 米的巨幅“日月潭”工艺磨漆器画，与其正对的是由白色大理石与木纹石构筑而成的一个“中”字图案。图案两侧的壁龛里，分别陈设民族英雄郑成功和“天后圣母”妈祖的脱胎漆塑像。大厅南、北两侧设置两个造型别致的屏风。

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的设立，是与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分不开的。

人民大会堂刚刚建成时，并未设台湾厅，因为当时规定由 28 个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各自承包和布置代表本地的厅，当时台湾没有这个条件。

1972 年 2 月，中美《上海公报》签署之后，解决台湾问题看到了希望。在人民大会堂中增设台湾厅，也就列入议事日程上来了。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负责办理此事，指定国家文物局协助指导办理。

台湾厅的筹备方案送批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特意邀请台湾同胞、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领导人来提一提意见并参与筹备工作，这些人当时多是全国政协委员。

台湾厅于 1972 年国庆节前建成，周恩来看后感到太小，又是在二楼，因此决定将一楼较大的浙江厅改为台湾厅，然后才正式对外开放。

人民大会堂那么多的厅堂，为什么单单要把浙江厅改为台湾厅呢？

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旅美台湾学者李南雄时，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周

恩来风趣地说：

“蒋介石是浙江人，他现在统治着台湾，我们把浙江厅改为台湾厅交给你们，这样很好嘛！”周恩来还说：“毛主席说寄希望于美国人民，这是从全世界范围内说的，在台湾范围内我要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后来，李南雄博士把浙江厅改成台湾厅的经历写成文章，在海外的刊物上发表，许多台胞读后深受感动。

台湾厅开放之后，正好赶上日本田中首相访华，所以日本客人成了台湾厅的第一批外国客人。田中首相访华是件大事，世界各国的记者都来关注，台湾厅的事情也随之传向全世界。

在此之后，凡有关台湾的各种活动都在台湾厅举行，周总理在台湾厅接见了若干批旅美台胞。台湾厅内的摆设，也是按照台胞的意见改进的，厅内的家具和器具，就是由香港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特地从香港购买台湾产的。

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病重住院期间，别的很多文件已经不能看了，但人民大会堂管理局根据海外台胞提的修改布置台湾厅的方案，周恩来还是抱病亲自审定了这个方案。

1975年12月下旬，周恩来的病情严重恶化，他已不能下床，生命处于弥留之际。

他让人立即找来对台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罗青长到医院来谈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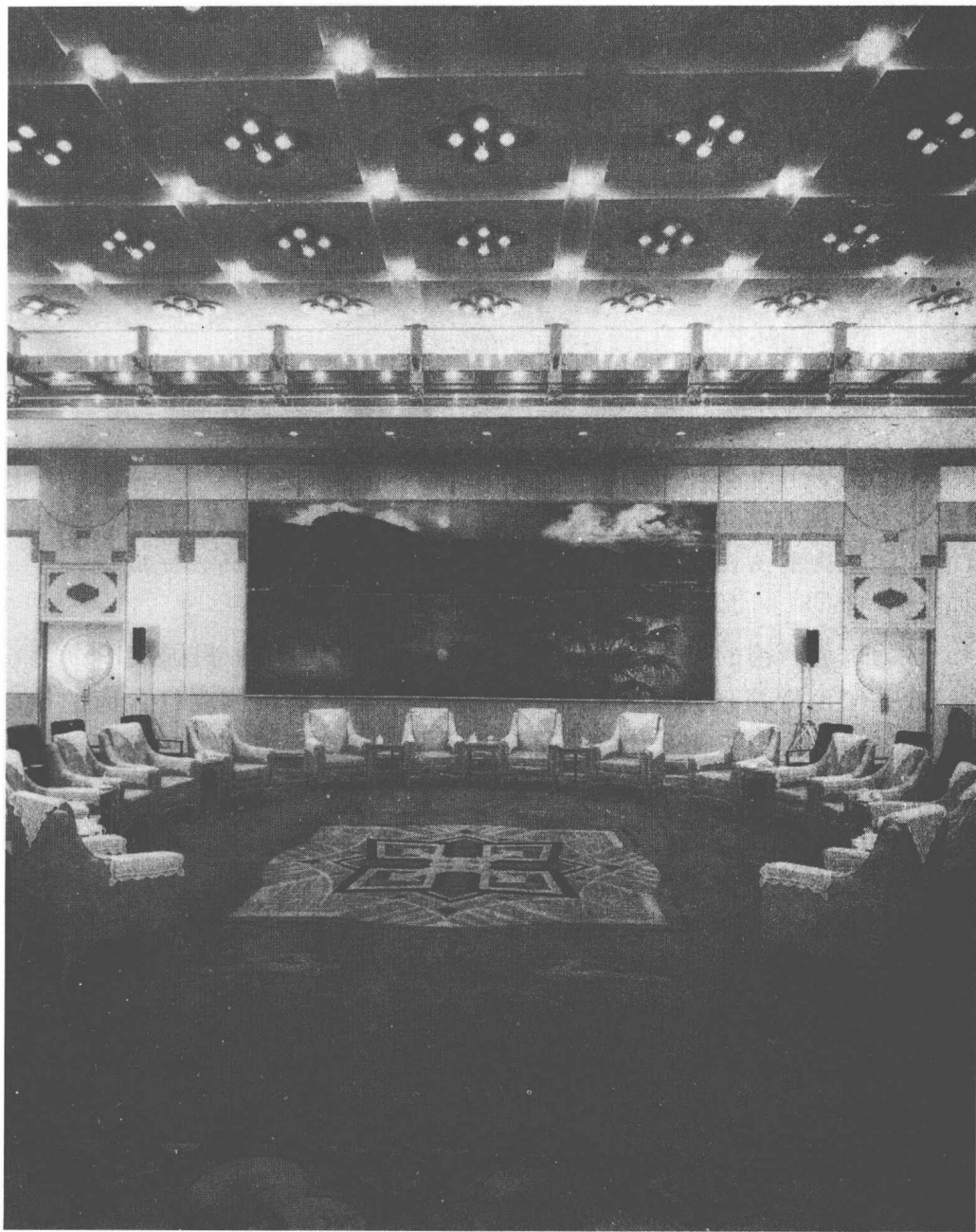
当时规定，只有政治局委员才可以去探望周恩来。后来邓小平发话说：

“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他见谁吧！”

罗青长来到周恩来的身边，周总理强忍着病体痛苦，跟罗青长谈起他在病中仍然关心着的台湾情况，关心着台湾的同胞和朋友。

周恩来叮嘱罗青长说“对于过去帮助过我们的朋友，你们做对台工作的人千万要记住，对于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一定要记住他，不要忘记他。”

周恩来关心的台湾朋友中，第一个就是张学良将军。周恩来钦佩他为民族作出的贡献，经常怀念这位“千古功臣”，并通过各种渠道与在台的张学良联系，关心张学良的生活和安全。



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全景。大厅西面主墙上悬挂一幅大型漆画  
《双潭映月》，描绘了日月潭美丽的夜色。

另外，像陈立夫、张群等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作出过贡献的朋友，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为保护毛泽东安全而做出努力的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等，周恩来都不曾忘记。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骨灰先是安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供干部、群众和国际友人悼念，不久，邓颖超根据周恩来生前的遗愿，带领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亲自将周恩来的骨灰盒移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暂放一夜，第二天才移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追悼会会场。

在人民大会堂中增设台湾厅，是中共中央对台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对台政策是“解放台湾”。1950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中国人民将以一切力量完成人民解放战争，肃清中国境内的一切残余敌人，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

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一直持续到1956年，为了统一祖国，1950年专门成立了由粟裕任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制定了具体攻打台湾的计划。为了培养台湾干部，把参加过“2·28”事件后退到大陆的干部和解放军中的台籍士兵集中在台湾干部训练团学习。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接着空军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以武力阻止大陆解放台湾，后来海峡两岸的紧张形势有所缓和，毛泽东提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

为此，中央成立了“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克农和罗瑞卿负责，徐冰参加，罗青长、凌云和童小鹏进行具体工作。

1956年春，中共托章士钊捎信，发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呼吁。

1957年初，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也曾派“立法院”立法委员宋宜山到大陆进行试探性接触。宋宜山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宋希濂的兄弟，宋希濂此时作为战犯，被关押在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宋宜山就是以探亲为名来大陆的。

金门炮战后，毛泽东出于统一祖国的真诚，在一次对省市委书记的



讲话中指出，对台湾“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

60年代初，经毛泽东审定的对台政策，可以归纳为“一纲四目”。

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为：一是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二是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当时台湾每年有8亿美元的赤字，毛泽东表示，8亿美元我们可以给；三是台湾的社会改革都可以从缓，必候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是双方互约不派遣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

毛泽东讲，你不派白色特务，我不派红色特务。台湾当局只要一天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改变目前对台湾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中，浙江奉化溪口蒋介石母亲和他的毛夫人的墓被破坏的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要浙江省委派人修好，并将修好后的照片送北京，交给章士钊带到香港转给蒋介石。针对港澳报纸说的“蒋氏墓庐已在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的运动中荡然无存”的说法，信的结尾写道：“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1972年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共同签署《联合公报》，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军队和军事设施，这就使台湾开始由原来的国际斗争为主转为主要是中国人民的内部问题了。

周恩来多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从美国、日本、台湾回来的同胞。

1973年，有一次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台胞时，会谈了五六个小时。

有个台湾青年问：“什么时候解放台湾？”

周恩来说：“台湾是一定要统一的，我可能看不到，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979年元旦的清晨，收音机里播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接着，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命令福建前线部队停止炮击金门岛的声明》。

当时任政协主席的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了新年政协大型座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周恩来一生为中国革命和共和国的建设事业鞠躬尽瘁。人民群众怀着悲痛的心情，前往灵堂瞻仰周恩来遗容。

谈会。他说：

“台湾回归祖国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告台湾同胞书》，体现了我们对台湾的回归和祖国统一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基本态度，但仍要做许多工作。

邓小平的讲话，语言不多，但信心撑满了人民大会堂。

1981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2周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在同新华社记者谈话时，详细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

这是继《告台湾同胞书》之后中共对台政策又一个重要文件，它标志着中共对台政策的具体化。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杨力宇教授，并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杨力宇是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曾长期研究邓小平，他是为收集了各类资料，撰写《邓小平传》而来。

这次谈话，邓小平第一次详尽阐释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这就是当时引起海内外普遍关注的“邓六条”。

邓小平对杨力宇教授不久前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中国统一之展望”讨论会表示称赞：“你们做了一件很好的事。”他还说：“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的。如果他们能完成这件事，蒋氏父子以及一切致力于中国统一事业的人，历史都会写得好一些。当然，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要多接触，增进了解。我们随时可以派人去台湾，可以只看不谈。也欢迎他们的人来，保证安全、保密，我们讲话算数，不搞小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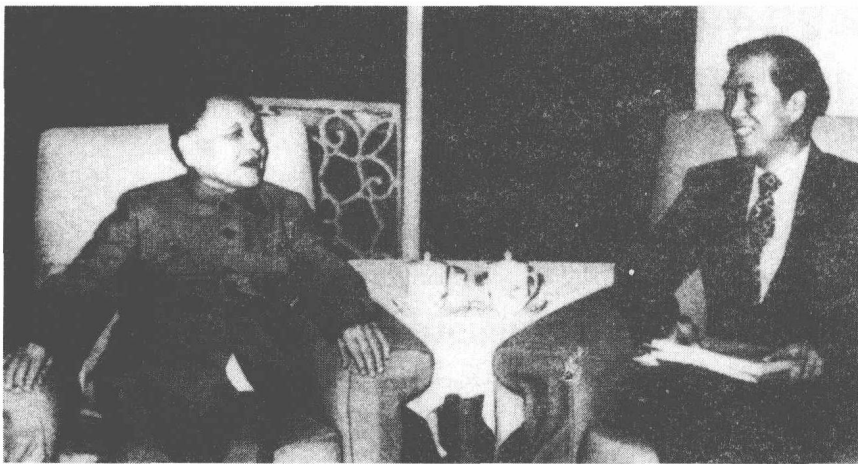
邓小平侃侃而谈，给杨力宇教授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邓小平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更使杨力宇感到由衷的钦佩。

同年8月，杨力宇在香港《广角镜》8月号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台湾与香港》的文章，描述了他同邓小平这次会谈的一些细节。

在人民大会堂中，邓小平提出，港台回归是中国的重大任务之一。在收回香港的主权后，中国将作适当的安排来保持香港的稳定及繁荣。统一后，台湾也有独立的司法权、立法权、适当的外事权及国际地位。台湾将使用特有的旗帜及“中国台湾”这一称号。

邓小平特别指出，台湾与香港不同：中国对香港强调“港人治港”，但对台湾则不能提出“台人治台”的方案，因“台人治台”似有“台独”的涵义。台湾一旦搞独立，就有沦为外国殖民地的危险，这是中国绝对不能容忍的。

1986年5月3日15时，46岁的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波音747货机机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  
阐述了实现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

长王锡爵，驾机从泰国曼谷机场飞往香港途中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

王锡爵原籍四川省遂宁市人，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去台湾。王锡爵表示，这次驾机返回祖国大陆，是他多年的愿望。

5月6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王锡爵和他的父亲王伯熙以及3个弟弟，对他回大陆定居表示欢迎。

为了解决“华航货机事件”，海峡两航开始举行谈判，冲破了两岸近40年来“不接触”的对峙局面，迫使官方性质的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以民间讯机构的身份，与大陆中国航空公司进行首次接触谈判。

1987年10月14日，在蒋经国主持的中常委会上通过了决议：除现役军人及现役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亲等以内的亲属，可赴大陆探亲。第二年起，台商开始在大陆投资。

1990年11月，台湾成立了“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主要办理台湾当局授权的有关两岸接触的业务性、技术性沟通工作，包括两岸人员交往事宜，初期计划基金为10亿元新台币。名誉董事长为孙运璿，董事长为辜振甫。

对于“海基会”的成立，大陆方面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1991年6月7日，大陆成立了以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为宗旨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左握手者）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右握手者）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这次会谈的圆满成功，标志着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荣毅仁为协会名誉会长，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张克辉、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林丽祖、台盟中央主席蔡子民为协会顾问，协会理事会第一届会长是汪道涵，常务副会长是唐树备。

1993年4月27日上午，海协会和海基会进行了举世瞩目的“汪辜会谈”，标志着台湾的“三不政策”实际已被打破，海峡两岸关系又迈出重要一步。

1995年1月30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新春茶话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这就是著名的“江八点”。

江泽民的讲话发表后，在海峡两岸及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 “两会”的由来

“两会”就是“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简称。人民代表大会主政，政治协商会议参政议政，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使“两会”在形式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它们召开的时间相差无几，召开的地点都是在人民大会堂，而且在届次上也完全统一起来。

这一切始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

细心的人们还会发现，随着“英明领袖”这颗政治彗星的陨落，一条叫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渐深入人心。

1983 年 6 月 4 日，按照惯例，在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召开之前，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政协委员，将列席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共商国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1949 年召开的政协一届会议，曾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政协继续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78 年政协恢复工作后，更以充沛的活力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到 1982 年底，全国有地方政协组织 1,800 多个，全国政协委员和各级地方政协委员超过 20 万人。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说过：“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

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

建国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毛泽东又提出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人们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认识到，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无论是对于革命战争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对于经济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今，中国共产党又提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进一步密切了党同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的关系，使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创建的人民政协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细心的人们在媒体上公布的六届政协委员中，惊奇地发现，在这届委员中，中共党员的比例减少到40%，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方面的非党代表人物增加了，知识分子的数量大幅度上升，爱国人士、台湾同胞和港澳同胞的代表也增加了。

新的委员名单中，包括了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各个时期一直到解放战争的许多在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名人的后裔，包括了许多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特赦人员和台湾国民党上层人士在大陆上的爱国亲属，还包括了一部分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加入中国籍的原国际友好人士。

6月4日下午3时半，全国政协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总数共2,039人，出席开幕式委员共1,794名。

邓小平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开幕式，并祝贺大会的召开。

《人民日报》在1983年6月18日第3版上，刊登了“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简历”，这也开创了全国政协会议的先河。

6月17日下午3时半，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邓颖超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选举杨静仁、刘澜涛、陆定一、程子华、康克清、季方、庄希泉、帕巴拉·格列朗杰、胡子昂、王昆仑、钱昌照、董其武、陶峙岳、周叔、杨成武、萧华、陈再道、吕正操、周建人、周培源、包尔汉、缪云台、王光英、邓兆祥、费孝通、赵朴初、叶圣陶、屈武、巴金等29人为政协



政协六后一次会议上，新当选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杨静仁主持大会。

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6月22日下午3时30分，在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结束一天之后，政协第六届一次会议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闭幕式。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杨静仁主持了大会。在19天的会议期间，政协委员们就政府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充满了民主、团结、奋发的氛围。

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颖超在热烈的掌声中致闭幕词。

她说：“人民政协作为我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在争取实现80年代三大任务的伟大斗争中，肩负着光荣的重大的历史使命。我和各位副主席、常务委员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群策群力，兢兢业业，做好工作，力求不负于各位委员和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期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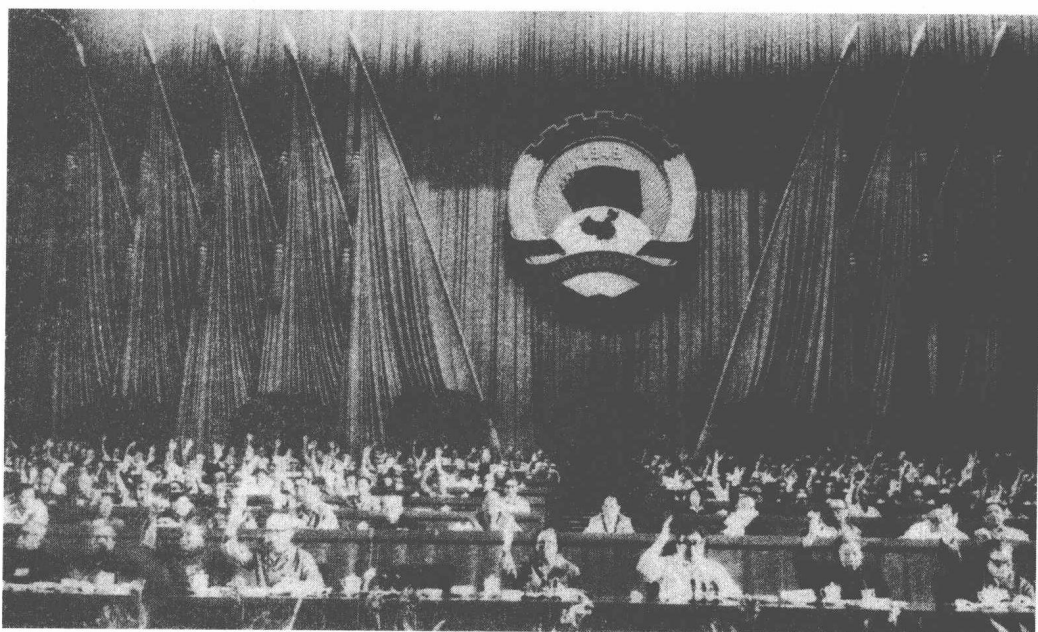
共和国第一任中央军委主席，也在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上诞生。

1983年6月6日下午3时，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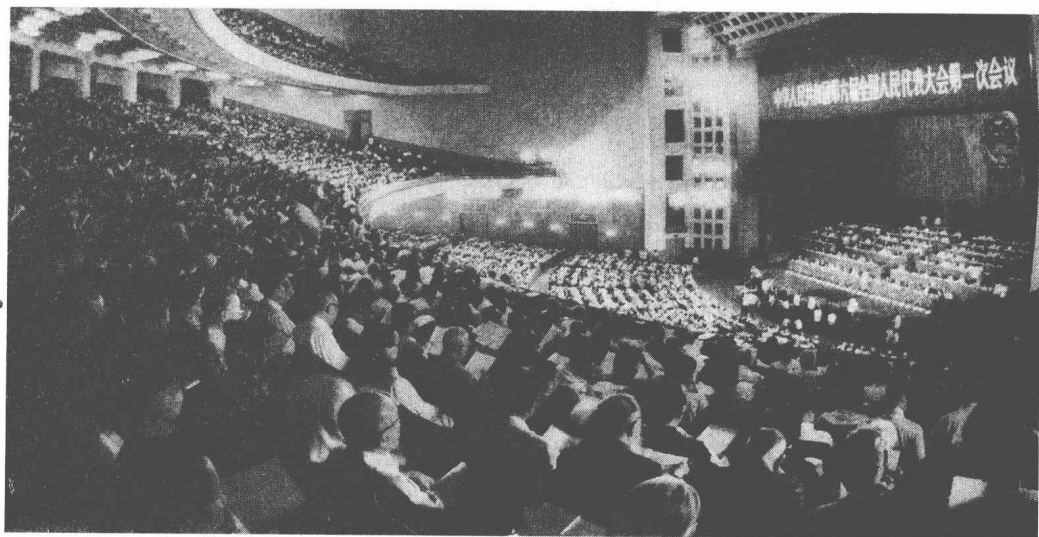
这是按照新宪法选举产生的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会的2,900多名代表，有76.5%是新选出的。

636名干部代表，体现出年轻化和专业化的特点，其有中国第一个女省长——47岁的江苏省省长顾秀莲；在铸造、材料及工艺的科研方





1983年6月，全国政协六后一次会议会场。



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面作出贡献的50岁的上海市副市长阮崇武；从事煤炭开发工作17年的高级工程师、50岁的山西省省长王森浩；还有在船舶设计方面有显著成果的49岁的湖北省女副省长梁淑芬。

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代表，占代表总数的23.5%。